

---

##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张 伟

---

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审蒋”，到“保蒋安全”，再到“释蒋”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没有矛盾，只是对和平解决方针的完善。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在“保蒋安全”的策略提出以前，即西安事变爆发的最初6天中，中共中央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还不能真正称得上是和平方针，这是因为，如果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将蒋“交人民公审”，西安事变是不可能和平解决的。

先从国民党方面来看。西安事变爆发时，蒋介石的权力已达到顶峰，有着较巩固的统治基础。事变只是扣押了蒋介石和他的一些高级将领，而他的军事力量照旧保存着。南京政府随时都可能进攻西安，而西北三方在军事上处于明显的劣势，没有足够的力量制止战争。一旦内战爆发，团结抗日就成了空话。这是因为，蒋介石虽然被扣，但他仍然是南京政府领袖，只有他才能够制止何应钦的讨伐，也只有他才能够统率国民党走上抗日道路。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地位，反映在西安事变后，尽管南京方面在营救蒋介石的方法上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但双方都希望张、杨释蒋返宁。冯玉祥早在12月14日便请当时在南京的马相

伯，“以私人名义，请张学良早日护送介公返京”。<sup>①</sup>孔祥熙也于17日致电张、杨：“最好兄能伴介公南返，或至太原，共同计议……盖劫持领袖逾久，吾兄所负责任逾重……国家民族之存亡，系于兄之一念。”<sup>②</sup>事变后主张讨伐的何应钦也曾致电张学良：“若不释出委座，实无以释群疑而平公愤。仍盼即日护委座南来。”<sup>③</sup>国民党其他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虽有各种不同的表态，但“要求放蒋，成为一致的呼声”。<sup>④</sup>这些情况表明正是在蒋介石被扣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南京与西安之间的严重对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是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这正如1937年3月毛泽东对史沫特莱所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先生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sup>⑤</sup>

再从共产党方面看。“审蒋”的口号与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既定方针也是矛盾的。西安事变前，中共中央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sup>⑥</sup>这一方针的依据，正如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认识，即蒋介石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最高领袖，他统率着全国最多的军队，把握着全国主要的经济力量，抗日无蒋，“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sup>⑦</sup>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共“逼蒋”的目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即“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

① 陈九如：《简评张学良送蒋返宁》，《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

② 《团结报》，1991年1月2日。

③ 张友坤：《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④ 丛一平主编：《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

⑤ 《新中华报》1937年3月29日。

⑥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

⑦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第273页。

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sup>①</sup>显然,当时中共已经把蒋看成是抗日统一战线要争取的重要对象。

但是,西安事变的爆发,却出乎中共的意料。张、杨突然扣蒋,无疑给中共带来了处置蒋的一次绝好机会。12月13日,中共中央讨论事变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他主张“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sup>②</sup>“审蒋”的目的当然不再是逼其“毅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国抗日,而是将其排除于抗日统战之外,并“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尽管“审蒋”已经超出了“逼蒋”的限度,但这种主张却为多数人所赞成。15日,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政府,明确表示:“公等(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sup>③</sup>这里,“审蒋”的意思也是非常清楚的。

上述情况表明,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最初几天,中共内部多数人赞成“审蒋”的主张。但是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审蒋”的原由并非是因蒋代表了亲日派,而是因为他不肯放弃“剿共”的政策。毛泽东提出“审蒋”主张的同时,明确认为“蒋最近立场”“是中间的立场”;红军将领致南京政府电中,也把蒋氏和“亲日派”分别开列,以示两者区别。这些提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未改变事变前对蒋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到抗日方面来的估计,而这种认识也正是后来迅速转到“保蒋安全”、“释蒋”策略的基础。但是,“审蒋”毕竟是打算从抗日统一战线中剔除蒋介石,这不能不说是“对原先的建立‘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sup>④</sup>提法的一种重大变更,与“逼蒋抗日”的方针存在着严重矛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第296页。

② 《中共党史风云录》,第178页。

③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第320页。

④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第252页。

盾。而事实上,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的口号,其依据就是蒋介石表现出了抗日倾向,尽管他在处理完两广事变后腾出手来全力进攻红军(这直接导致了西安事变),但是他与日本的矛盾并没有改变。因此,西安事变后,‘审蒋’的策略是不合适的,它违反了中共‘逼蒋抗日’的初衷。

最后从张、杨方面来看。‘审蒋’的策略,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也不相符。张、杨二将军发动事变的初衷,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结束内战,领导全国抗日。张学良在事变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将这个目的说得很清楚:发动事变是“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迫其(指蒋介石)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sup>①</sup>,以行抗日国策。为了消除外界对“兵谏”的误会,张、杨12月13日在《对时局通电》中,还特别提出对蒋介石要“保其安全,促其反省”。<sup>②</sup>张学良还在同一天更进一步声明:“现在蒋介石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sup>③</sup>

应当承认,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特别是在下层官兵里,确实有过‘审蒋’甚至‘杀蒋’的呼声,但同,策划并主导着事变进程的张、杨两将军,显然并不赞成这种主张。而由于他们在西安事变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没有他们的认可,‘审蒋’,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循此策略当然也就谈不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从以上3个方面的分析中不难得出结论,‘审蒋’主张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绝不相容。但是,在蒋介石正准备组织百万兵力向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的时候,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中共内

① 《中共党史风云录》,第31页。

② 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08页。

③ 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09页。

部产生“审蒋”主张，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尤其是在事变突然发生，由于消息闭塞，中共尚未全面了解国内外各种势力对事变的反应的情况下，要求它立即制订出一套完整、正确的应变决策，那是不可能的。

历史的事实是，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应张、杨邀请抵达西安，通过与各方深入接触，对国内外复杂的局势有了广泛的了解，并把消息传送到陕北之后，中共中央才放弃了“审蒋”主张，于18日制订了“保蒋安全”的策略，真正抓住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19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党内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并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提议召集和平会议通电》，公开地、全面地阐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从那时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协助和调解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荣维木)